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4 Sept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禁止酷刑委员会

###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775/2016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X (由律师 Roman Schuler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6 年 10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 条和第 115 条做出的决定, 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19 年 8 月 5 日
事由:	被遣返至埃塞俄比亚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原则; 酷刑
所涉《公约》条款:	3

1.1 申诉人 X, 1977 年出生, 埃塞俄比亚公民。他声称, 将他遣返至埃塞俄比亚, 缔约国将侵犯他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该缔约国于 1986 年 12 月 2 日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1 款做出了声明。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6 年 10 月 25 日, 禁止酷刑委员会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采取行动, 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人的申诉期间不要将其遣返至埃塞俄比亚。2016 年 10 月 27 日, 缔约国报告说, 根据委员会的要求, 申诉人的遣返已暂停。

\* 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9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 费利斯·盖尔、阿卜杜勒-瓦哈卜·哈尼、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 申诉人提交的事实

2.1 申诉人在亚的斯亚贝巴长大。他的父母为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的德尔格政权工作。申诉人的父亲于 1979 年在与来自泰格雷地区的抵抗战士发生争执时被杀。此后，申诉人的母亲工作于该独裁政权的特情局。1991 年该政权倒台后，申诉人的母亲由于为该独裁政权工作过而被监禁。她在监狱里遭受了很多年的折磨，并死在那里。

2.2 由于申诉人认为当前的统治政权对其父母的死亡负有责任，于是他成为该政权的积极反对者。2005 年，他加入了 Kinijit 党。他在党内的角色是动员年轻选民，招募新成员和分发传单。Kinijit 党在 2005 年举行的选举中获胜，但政府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在抗议活动中，申诉人向警察投掷石块，并放火焚烧汽车。此后，他受到迫害并躲藏起来。

2.3 2006 年 10 月，埃塞俄比亚特情局找到了申诉人并将其监禁，起初是在 Maekelawi 监狱，然后是 Zone 监狱。在监狱里，他遭到殴打和虐待。他的背上因殴打而留下了伤疤。由于缺乏证据证明他有罪，他于 2007 年 2 月获释。

2.4 2009 年，政府取缔了 Kinijit 党。申诉人接着成为地下党 Ginbot 7 的成员，该党由 Kinijit 党的前成员 Berhanu Nega 和 Andargachew Tsege 于 2008 年 5 月创立。Ginbot 7 在埃塞俄比亚和国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积极分子网络。在 Ginbot 7 内部，申诉人继续他在 Kinijit 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数次因与 Ginbot 7 有关联而被警方拘留，但每次都因证据不足而获释。2013 年，当申诉人的上级被监禁时，申诉人决定离开埃塞俄比亚，因为他担心他的上级会受到酷刑，并会泄露关于他的信息。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申诉人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躲藏起来。

2.5 2013 年 5 月 26 日或 27 日，申诉人在一名走私者的陪同下开车离开埃塞俄比亚。他们在苏丹呆了一个月，然后飞往瑞士。2013 年 6 月 28 日，申诉人抵达瑞士并申请庇护。2013 年 7 月 8 日和 8 月 15 日，他接受了当时的联邦移民局的面谈。该局于 2015 年更名为国家移民秘书处。2015 年 11 月 3 日，国家移民秘书处拒绝了申诉人的庇护申请。2016 年 1 月 14 日，联邦行政法院发布了一项临时决定，驳回申诉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理由是该申请初步来看缺乏理据。2016 年 8 月 30 日，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再没有其他的国内补救办法了。

2.6 在瑞士，申诉人通过参加几次活动来继续其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政治行动。2013 年 11 月 20 日，他参加了在沙特阿拉伯驻伯尔尼大使馆前举行的示威活动，抗议埃塞俄比亚人在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暴力。2014 年 8 月 7 日和 2015 年 3 月 20 日，他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反对拘留 Ginbot 7 秘书长的抗议活动。在后一次抗议中，申诉人撕毁了执政的泰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党的旗帜，并行进在示威队伍的前排，旁边是 Ginbot 7 的领导人之一 Afework Agedew。2015 年 10 月 3 日，他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和电台(ESAT)的五周年庆祝活动。当时埃塞俄比亚政府认为 ESAT 是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宣传渠道。在庆祝活动中，申诉人与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拍照合影。2016 年 1 月 25 日，申诉人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呼吁全球声援奥罗莫人的抗议活动。网上发布的一段集会视频显示，申诉人在前排行进，然后跪了下来，像个囚犯一样。2016 年 2 月 28 日，他参加了 Ginbot 7 的集会，并与美国 Ginbot 7 的领导人 Ephrem Madebo 合影。

2016年6月5日，申诉人参加了 Ginbot 7 的筹款活动，并被拍摄到站在讲台上，旁边是 Nega 先生。2016年8月16日，申诉人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公开示威，抗议埃塞俄比亚镇压反对派。申诉人还定期向驻瑞士的埃塞俄比亚救济和发展组织提供资金捐助。

##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若将他遣返埃塞俄比亚，缔约国将侵犯他的权利，因为在那里他将面临极大风险，遭受酷刑或者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声称，他将因为他的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活动而被逮捕，地点很可能是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机场，并将被埃塞俄比亚特勤局的特工拘留、折磨和审问。由于他过去曾在埃塞俄比亚遭受酷刑，可以预见，他将面临在那里再次遭受酷刑的风险。

3.2 在 2007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发布的决定中，联邦行政法院指出，埃塞俄比亚当局监视侨民的活动，被认定为政治活动家的侨民一旦抵达埃塞俄比亚即可能被捕，除非他们与以前的政治活动明确保持距离。

3.3 国家移民秘书处在其关于申诉人庇护申请的决定中认为，他没有就他的政治活动提供详细的答复，他对相关事件的叙述存在事实差异。此外，秘书处认为申诉人关于监禁的说法不可信。联邦行政法院认为，申诉人的个人情况不足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

3.4 然而，申诉人向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通报了他在监禁期间遭受的酷刑。他还提供了他背上伤疤的照片。这些伤疤的形状清楚地表明这些伤痕是鞭打造成的。然而，法院并没有下令进行体检，而只是声明伤疤的原因不明，照片并不能证明他曾受到过迫害。瑞士当局未能充分审查申诉人关于他过去曾遭受酷刑的说法，这表明当局没有适当评估他返回埃塞俄比亚后将面临酷刑的风险。<sup>1</sup> 申诉人没有能力自费进行体检。

3.5 虽然申诉人在他的庇护面谈中曾说受到了酷刑，但他的面谈官员没有接着问任何后续问题，而是改变了话题。申诉人说，他曾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被监禁且遭受酷刑。作为回应，面谈官员问他，除了监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令人难忘的事件。申诉人也没有被进一步问及其他几次被警方拘留的问题。

3.6 联邦行政法院还无视了 2015 年 11 月 20 日由 Ginbot 7 在美国的一个分支机构发出的一封信。该信除其他外指出，申诉人是争取正义、自由和民主的 Ginbot 运动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埃塞俄比亚民主普及运动的各项活动；而且 Ginbot 7 确信，如果瑞士迫使他返回埃塞俄比亚，他将在专制政权的特工手中遭受重创，该政权花费数百万美元一直监视对 Ginbot 7 组织有任何同情或从属关系的个人。同一封信中还指出，Ginbot 7 的成员易受攻击，需要保护，以免受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系统迫害，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利用间谍活动观察生活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申诉人坚持认为，美国的 Ginbot 7 分支机构只向老党员提供这类信件，该运动的同情者是不会有的，尽管如此，法院在对申诉人的上诉做出决定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关键证据。

<sup>1</sup> 申诉人援引 Ali Fadel 诉瑞士案(CAT/C/53/D/450/2011)，第 7.6 段。

3.7 从申诉人在筛选面谈和实质性庇护面谈的陈述不一致之处得出的任何不利推论都必须谨慎看待，因为在前一次面谈中申请人被要求做简要说明。<sup>2</sup> 无论如何，申诉人详细、一致和可信地叙述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活动以及他的被捕、拘留和随后的迫害。他还提供证据表明，由于在瑞士进行的政治活动，他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足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

3.8 虽然瑞士当局从申诉人获释后仍留在埃塞俄比亚并为商业目的多次前往泰国这一事实中得出了不利的推论，但这些情况并未对他在监禁和迫害方面的可信度产生负面影响。申诉人留在埃塞俄比亚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很活跃，希望看到他的祖国发生变化。他在庇护面谈中多次表示，尽管与当局多次遇到矛盾，但他并不想离开埃塞俄比亚。他在上级被捕后才离开埃塞俄比亚，担心将来会受到迫害。

3.9 与国家移民秘书处的调查结果相反，申诉人没有就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根源发表模糊的声明。他明确表示，2005 年，他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向警察投掷石块，并放火焚烧汽车。他还表示，他认为政府对他父母的死亡负有责任。尽管自 1991 年母亲去世以来，他一直是反对派的同情者，但他与当前政权的积极斗争直到 2005 年才开始。

3.10 虽然瑞士当局认为申诉人没有充分描述 Kinijit 党的组织和架构，但申诉人在给联邦行政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他在庇护面谈中没有理解就这一点提出的问题。然而，申诉人向面谈官员提供了一些关于该党的起源和目标的信息，以及该党领导人的姓名。

3.11 虽然瑞士当局认为申诉人在 Ginbot 7 内缺乏联系是不可信的，但他曾两次表示，他在 Ginbot 7 内部只与他的上级联系，从未与其小组的其他成员见过面，这是 Ginbot 7 内部的标准做法。Ginbot 7 设有等级架构。

3.12 最后，国家移民秘书处错误地认为申诉人就其离开的原因提供了相互矛盾的陈述。虽然申诉人在筛选面谈中先后表示，他离开埃塞俄比亚是因为他的上级和他的朋友被监禁，但实际上他指的是同一个人。

3.13 几个非政府组织已经报告说，埃塞俄比亚当局已宣布 Ginbot 7 为恐怖组织，持不同政见团体的成员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打击。<sup>3</sup> 据美国国务院称，反对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sup>4</sup> LandInfo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09 年 Ginbot 7 的许多成员根据一项反恐法律被逮捕，其中 5 人被判处死刑。<sup>5</sup> 申诉人声称，2014 年 6 月 30 日，Ginbot 7 的秘书长 Tsege 先生在也门被拘留，并被引渡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被埃塞俄比亚特勤局的特工下药并施以酷刑。<sup>6</sup> 自

<sup>2</sup> 申诉人援引欧洲人权法院，M.A.诉瑞士，52589/13 号申请书，判决，2014 年 11 月 18 日，第 60 段。

<sup>3</sup> 申诉人除其他外援引了大赦国际，“消除异议：加强打击埃塞俄比亚的言论自由”（2011 年 12 月）；和自由之家，“埃塞俄比亚，新闻自由 2016”，2016 年 9 月。

<sup>4</sup> 申诉人援引美国国务院，“2009 年关于人权做法的国家报告：埃塞俄比亚”，2010 年 3 月 11 日。

<sup>5</sup> 申诉人援引 LandInfo，原籍国信息中心，“埃塞俄比亚：Ginbot 7 党”（2012 年 8 月），第 8 页。

<sup>6</sup> 申诉人特别援引 BBC 新闻，“埃塞俄比亚总理 Hailemariam 为 Andargachew Tsige 逮捕辩护”，2014 年 7 月 11 日。

2016 年 8 月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至少有 100 人已在政治抗议活动中丧生。这些报告表明，不同政见在埃塞俄比亚受到严厉压制，申诉人如果返回该国，将面临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的真正风险。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该缔约国在 2017 年 4 月 25 日的意见中承认，埃塞俄比亚当下的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令人担忧。然而，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申诉人在返回埃塞俄比亚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这种风险。

4.2 在评估申诉人如果返回埃塞俄比亚将面临的酷刑风险时，应考虑申诉人过去遭受的任何酷刑。然而，申诉人关于他遭受虐待的指控是不可信的。第一，在庇护程序中，他对自己的政治活动的描述非常含糊且自相矛盾。因此，关于他因这些活动而被拘留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申诉人关于他被拘留的说法与以下事实相矛盾：根据他在庇护程序中的说法，他获释后在埃塞俄比亚逗留了六年，并没有再次受到当局的骚扰。此外，他声称 2011 年带着有效护照离开埃塞俄比亚数次，然后再返回该国，与当局没有产生任何问题。由于他背部的伤疤来源不明，而且他的说法不可信，所以这些伤疤并不构成支撑他说法的证据。

4.3 缔约国当局没有下令对酷刑迹象进行体检，因为申诉人的叙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且不合逻辑。根据国家当局的判例，寻求庇护者必须参与确定事实，在本案中，申诉人没有提交体检报告以支撑其说法。申诉人是由律师代理，并登记参加了一项强制性健康保险。因此，他当时有机会向瑞士当局提交一份体检报告的。

4.4 申诉人声称，他没有机会详细陈述他所遭受的虐待，这是不正确的。在申诉人提到的庇护面谈部分之后，面谈官员回到了申诉人被拘留的问题上，并就这一问题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听证结束时，面谈官员明确邀请申诉人将他的叙述讲完。此外，如果申诉人认为他在面谈期间未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他在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的上诉和本来文中都有机会这样做，但他没有把握机会。他的叙述很简短，他并没有试图描述他声称所遭受的虐待或其他相关情况。

4.5 申诉人声称在 2007 年出狱后又多次被捕，但他在庇护程序中表示，他在获释后不再害怕当局，因为当局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这是提交人申诉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不一致。

4.6 申诉人对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活动的描述言辞含糊，闪烁。当被要求具体说明他为 Kinijit 党开展的活动时，申诉人解释说，他参加了许多示威，动员了年轻的支持者，并领导了不同的活动。这样的描述是肤浅的。当被要求描述 Kinijit 党的组织架构时，申诉人最初回答说，当初居住在美国的埃塞俄比亚人建立该党时，他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有人就这一话题向申诉人提出了几个问题，但申诉人未能提供具体的答复。当被问及该党的架构时，他只是说，当正式成员从美国抵达后，选举就要开始了。这些不准确和含糊其辞的答复给人的强烈印象是，申诉人没有经历过他所描述的政治活动。虽然他给出了几个该党领导人的名字，但他无法对该党的架构或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描述。

4.7 关于申诉人为 Ginbot 7 开展的活动，申诉人最初声称，他会见了他的小组成员，并与他们一起开展了活动。然而，在他的第二次庇护面谈中，他声称只接触过 Ginbot 7 的一名成员。当被问及这一明显的矛盾时，申诉人解释说，他在第一次庇护面谈时被误解了。然而，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因为申诉人在第一次面谈时明确表示，他是与 Ginbot 7 中他的小组一起行动的。

4.8 关于他在瑞士的政治活动，该缔约国承认埃塞俄比亚当局最近加强了对居住在国外的政治反对者们的监视。然而，埃塞俄比亚当局集中注意一些个人，这些人除了参加国外低调政治抗议之外，还担任某种职位，或进行一些表明他们是该政权严重的潜在危险对手的活动。然而，申诉人并不属于这一类持不同政见者。他参加瑞士的抗议活动构成边缘激进主义，并不表明他会被埃塞俄比亚政权视为严重和潜在危险的对手。他提供的在瑞士参加的抗议活动照片没有显示他处于突出的位置，也没能证明他进行了公开的个人活动。除了参与这些活动和他自称是 Ginbot 7 的成员外，他提供的文件并未表明他参与了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动。申诉人提供的声明他是 Ginbot 7 成员的信是一份副本；申诉人没有提供原始文件，因此没有证明他的成员身份。

4.9 申诉人提到了 2016 年颁布的联邦行政法院的判例，指出对属于反对派并生活在国外的埃塞俄比亚活动人士的镇压和监视有所增加。然而，该决定中涉及的案件与申诉人的案件不能进行比较。在 2016 年判决的案件中，申诉人合理地表明，他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进行的一些政治活动，将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对他的注意。在本来文中，情况并非如此。

4.10 在两次庇护面谈中，申诉人以非常肤浅且经常回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当要求他描述所遭受的迫害时，他最初说，他的问题开始于 2004 年或 2005 年，但又无法具体说明所涉及的问题。当请他描述他的问题是如何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说，如果不是执政党的成员，就不可能上中学或大学，要获得工作许可也得该政权批准才可以。当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说他的问题开始于 2004 年或 2005 年时，申诉人回答说，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因该政权而死，所以他成为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说法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的问题开始于 2004 年或 2005 年，因为正如申诉人在第一次庇护面谈时所说的那样，他的父母分别于 1979 年和 1995 年去世。当请他描述所涉问题时，申诉人声称他投掷石块，并放火焚烧小汽车和公共汽车。面谈官员重复了关于他所遇到的问题的提问。申诉人答复说，选举已经开始了。面谈官员再次重复了同样的提问。申诉人随后答复说，他痛恨造成其父母死亡的当前政治局势，并想推翻该政权。显然，申诉人无法回答关于他声称所遇到的问题的提问。

4.11 除了上述矛盾之外，申诉人关于其上级被逮捕的叙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在第一次面谈中，他声称他的一个朋友被逮捕并失踪了。申诉人声称，他的朋友在拘留期间遭到殴打，并泄露了他们组织的秘密。当上级后来被逮捕时，申诉人决定逃离埃塞俄比亚。然而，在第二次面谈中，申诉人只说有一人被逮捕。当被问及这一矛盾时，申诉人说，他不是在他自己。这似乎是企图回避这个问题。然后面谈官员又重复了一遍问题，问到底是谁被捕了。申诉人答复说，还有一名同事也被拘留了。在请他澄清这一说法时，他补充说，他是听说的那次逮捕，当时他已经离开了埃塞俄比亚。这些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4.12 同样，申诉人关于其家庭的陈述也难以令人信服。申诉人无法提供关于他妻子和孩子的信息。他说，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他告诉他的妻子躲藏起来，此后不知道如何与她联系。他无法提供关于这一点的任何额外细节。当请他描述他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与妻子进行的讨论时，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当时他想挽救自己的生命，要尽快离开埃塞俄比亚。他告诉他妻子的只有她必须躲藏起来。这些说法闪烁其辞，缺乏说服力。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申诉人不知道如何联系他的妻子。

4.13 申诉人除了描述在埃塞俄比亚冈德度过的一夜以及徒步穿越边界之外，无法描述他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喀土穆的汽车旅程。他也无法提供从喀土穆飞往瑞士的航程中的任何细节。他向瑞士当局提供了一张 2013 年 8 月 5 日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签发的身份证。他声称，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他把这张身份证留在了一家录像店，朋友们去那里找过。当请他澄清这些说法时，他回答地语无伦次。

4.14 鉴于上述情况，没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将申诉人遣返埃塞俄比亚将构成缔约国对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的违反。

####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案情意见的评论

5.1 在 2017 年 6 月 7 日、2018 年 1 月 25 日和 6 月 8 日以及 2019 年 3 月 20 日的评论中，申诉人说，在资金资助下，他得以为查验酷刑迹象而进行体检。他提供了一名全科医生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出的报告，其中指出，申诉人于 2017 年 5 月 2 日进行了体检。报告还指出，申诉人声称遭受酷刑，“被人用枪托击打头部”，用电缆反复抽打背部。报告还指出：“有 10 个绳索状疤痕可见，这些疤痕与脊柱呈十字交叉，长度在 10 至 15 厘米之间。疤痕位于下胸椎和中胸椎之间，目前未受刺激。此外，在左肩胛骨的末端有一个小疤痕，以及前面左侧有一个长疤痕，这是枪托击打造成的。在询问结束时，[申诉人]确信地说，2006 年的酷刑仍然影响着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他还要照顾他的妻子和孩子。指定位置的疤痕符合[投诉人]给出的描述。所描述的背痛无法客观化。”该报告还包括一份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申诉人坚持认为，报告证实了他关于遭受酷刑的说法。

5.2 申诉人还提供了 2017 年 12 月 14 日的又一份体检报告和译文。他声称，编写报告的医生是瑞士红十字会为酷刑受害者服务的长期顾问，因此是研究酷刑迹象的专家。根据翻译后的报告，医生观察到下胸椎和骶骨之间有八个弯曲的、可触及的红色疤痕，集中在脊柱上方，长度约为 4 至 6 厘米，最大宽度达 5 毫米。他的结论是，这些伤疤与“电缆抽打后的典型疤痕样式”一致，与申诉人的说法一致，即他在 2007 年“受到电缆抽打的折磨”。申诉人重申，瑞士当局没有履行其查明所有相关事实的义务，包括下令对酷刑迹象进行体检。

5.3 针对缔约国关于申诉人在获释后决定留在埃塞俄比亚长达六年的说法，申诉人坚称，在此期间他没有被当局发现是因为他躲藏起来了，并多次改变了居住地。他秘密进行政治活动，所以当局找不到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申诉人能够在 2011 年几次安全地离开和返回埃塞俄比亚。直到同年小组领导被捕时，申诉人才开始害怕受迫害。在此之前，当局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据。

5.4 申诉人质疑缔约国的说法，即他在庇护面谈中的回答缺乏足够的细节。他对他所遭受的酷刑描述地非常详细，如果瑞士当局认为他的回答过于简短，瑞士当局有责任提出更多的问题。相反，当局没有提出具体问题，却经常在关键时刻改变话题。申诉人还几次描述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活动，但没有被要求提供更多的细节。因此，不能批评他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回避或模糊的答案。他就 Ginbot 7 的组织提供了相当准确的答复，但无法更具体地回答，因为像申诉人这样的普通成员是没有关于该党内部组织的信息的。申诉人没有自相矛盾：他多次解释说，他是一名活动人士，也是 Ginbot 7 的成员，但没有与该党党首的直接联系方式。Ginbot 7 采用等级架构以保护其成员。

5.5 缔约国评论说，证明申诉人是 Ginbot 7 成员的信件只是一份副本。作为回应，申诉人另外单独提供一封原件，由 Ginbot 7 美国分支机构的一名代表于 2017 年 6 月 11 日发出。<sup>7</sup> 该代表重申，申诉人是 Ginbot 7 的成员，并积极参与诸如出席会议和示威、筹款和捐款等活动。

5.6 申诉人声称他已经加强了他在瑞士的政治活动，并声称此类活动如此频繁和重大，无疑引起了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申诉人在 Ginbot 7 中的任务包括保障安全、招募新成员、邀请成员参加政治活动、在每月会议期间更换州党魁、参与讨论和分发传单。申诉人还签署了一份关于在美国支持埃塞俄比亚民主化的立法法案的网上请愿书。

5.7 申诉人提供了一封由在瑞士的埃塞俄比亚人权与民主工作组秘书 2017 年 1 月 26 日发出的信，该秘书在信中指出，申诉人自 2015 年以来一直是一名积极成员，并参与了各种公开活动的举行。具体而言，2017 年 2 月 11 日，他参加了在瑞士弗里堡举行的为 Ginbot 7 和埃塞俄比亚人权与民主工作组筹款的会议。2017 年 2 月 11 日，他还与 Nega 先生一起帮助组织了一次用 Skype 直播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当前局势的现场讨论。申诉人安排汽车交通，打电话给各位与会者，并帮助保障讨论期间的安全。

5.8 2017 年 5 月 6 日，申诉人出现在埃塞俄比亚驻瑞士大使在日内瓦大使官邸举行的年会上。那次会议目的是讨论埃塞俄比亚目前的政治问题，大使邀请了泰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各区域代表参加。虽然该活动的官方说法是对所有埃塞俄比亚人开放，但却明确表示只欢迎政府支持者。一群包括申诉人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行带离会议室。骚乱中有三人受伤，会议协调员报了警。警方询问了申诉人和其他八名持不同政见者，并要求他们提供个人资料和身份证件。申诉人不知道泰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在这一事件后是否对他提出了刑事起诉。<sup>8</sup> 申诉人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在 ESAT 电台就该事件接受了采访。这段阿姆哈拉语访谈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申诉人提供了一份访谈的文字整理稿。

5.9 缔约国声称，在大使官邸的会议录像中看不到申诉人，对此，申诉人说，他要求日内瓦警方提交报告，以确定他在该活动中的存在。他提供了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8 日的报告，其中说埃塞俄比亚领事馆的一名代表给警察打了电话。申诉人身份被检查，姓名被确认，并从领事馆被押送至火车站。申诉人还提供了另一段视频记录，显示他于 2017 年 5 月 6 日在领事馆前。

<sup>7</sup> 申诉人还提供了随信附上的信封，信封上有美利坚合众国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邮戳。

<sup>8</sup> 申诉人提供了据称在会议上拍摄的三张照片。



5.10 由于申诉人被埃塞俄比亚领事馆工作人员指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反对者，政府不会像缔约国声称的那样认为他是一个低调的持不同政见者。根据《埃塞俄比亚刑法》第 241 条，攻击国家政治上的领土完整是一种罪行，可判处 10 至 25 年监禁。申诉人不能指望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获得大赦，即使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局势在 2018 年发生了变化。

5.11 2017 年 5 月 22 日，申诉人帮助组织和协调了在日内瓦联合国前举行的示威活动。示威者反对 Tedros Adhanom 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声称他对许多无辜埃塞俄比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sup>9</sup> 该示威活动的视频已经发布到 Facebook 上。事件发生后，申诉人接受了瑞士 Kanal K 电台约 10 分钟的采访。Kanal K 是 Aargau 州的一家当地电台。如有要求，可提供阿姆哈拉语的采访录音。

5.12 2017 年 6 月 18 日，申诉人和 Nega 先生出席了在伯尔尼举行的 Ginbot 7 会议。申诉人负责安保，穿着橙色背心以示身份。他提供了一张照片，据称照片里有他和 Nega 先生。2017 年 11 月 4 日，申诉人参加了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 ESAT 年会，并提供了一张照片，据称照片显示他站在一名记者旁边。

5.13 此外，在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另一起案件的裁决中，联邦行政法院向一名埃塞俄比亚申诉人提供了庇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埃塞俄比亚出现了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新总理发起的改革进程的可持续程度目前是不可预见的，也不能肯定其人权状况以及政治反对者和政治活跃的流亡者的待遇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会有长足地改善。<sup>10</sup> 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相似的。两名申诉人都是反对派成员，他们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都遭到监禁和酷刑，并在瑞士期间上了 ESAT 的节目。因此，申诉人在埃塞俄比亚仍然面临迫害的威胁。

### 缔约国提交的补充意见

6.1 在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2 月 15 日和 2019 年 3 月 7 日提出的进一步意见中，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提供的第一份体检报告仅表明申诉人经历了创伤，但不能确定造成创伤的事件情形。创伤不一定是由虐待的酷刑行为造成的。虽然申诉人的伤疤在第一次报告中被提到，但酷刑标记只能由法医专家确定。撰写第一份报告的医生是全科医生，而不是专家或精神病学家；因此，该报告的证明价值有限。缔约国重申其立场，即鉴于申诉人的叙述不一致，在庇护程序中进行体检是多余的。此外，即使所涉伤疤是由他人造成的创伤导致的，这也不足以证明是国家行为主体或准国家行为主体实施了虐待。第二份体检报告只能确定申诉人在某个未指明的时刻遭受了虐待。它不能确定虐待是由埃塞俄比亚当局对他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也不能证明申诉人受到虐待。

6.2 缔约国重申，申诉人在所声称的 2006 年和 2007 年被拘留和遭受酷刑后，仍能够安全地在埃塞俄比亚逗留六年，且于 2011 年离开埃塞俄比亚几次，然后又选择返回埃塞俄比亚。鉴于这些情况，没有理由得出结论申诉人在埃塞俄比亚会有遭受酷刑的风险。

<sup>9</sup> 申诉人提供了一些照片，据称可以看见他站在示威队伍的前面。

<sup>10</sup> 申诉人援引联邦行政法院第 D-6079/2015 号和第 D-6086/2015 号决定，2019 年 1 月 30 日，第 7.6 段。

6.3 虽然申诉人提到他最近在瑞士从事的几项政治活动，但这些活动本身并不能证明他有充分理由担心在埃塞俄比亚会受到迫害。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没有展现出“曝光度特别高的政治活动”，以证明他可能引起了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并被视为当前政权的具体危险。埃塞俄比亚人权和民主工作组提供的信件是一封便函，即使与照片一起考虑，也没有体现出“有曝光度”类型的政治参与。申诉人据称参加了2017年6月7日和18日的Ginbot 7会议以及2017年11月4日的ESAT年会，但并没有达到足够的政治参与曝光度。ESAT和Kanal K电台节目相对较短，并对各种人进行了大量采访。申诉人没有将自己与ESAT采访的其他个人区分开来，而且他不太可能因为这一露面而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埃塞俄比亚当局也不太可能知道Kanal K节目，因为该节目是在瑞士当地电台播出的。此外，申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在Kanal K节目上接受了采访。

6.4 在大使官邸2017年5月10日举行的会议的录像中看不到申诉人。因此，不能确定他是否参加了那次活动。他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他受到了日内瓦警方或大使馆安全人员的指认。

6.5 Ginbot 7发出的关于成员资格的新信函看上去是一封便函，并未证明申诉人是Ginbot 7的成员。经常会有这种性质的伪造文件。此外，信中没有说明申诉人入党的日期，也没有详细描述他在党内的活动。新信件与Ginbot 7于2011年11月20日发出的信件在几个重要方面(即该党的徽标、名称及电子邮件地址)也有显著不同。

6.6 2019年1月28日的警方报告只表明日内瓦警方知道了申诉人的身份。这并不表明埃塞俄比亚当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样，申诉人提供的录像也没有为其各项说法提供证据。

6.7 即使埃塞俄比亚当局知道申诉人的身份，该国最近的政治事态发展表明，如果返回埃塞俄比亚，申诉人将不会面临违反《公约》第3条的待遇。自2018年4月上台以来，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领导或宣布了许多领域的改革，包括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埃塞俄比亚政府呼吁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返回埃塞俄比亚并参与政治进程，持不同政见者、前反叛分子和记者自2018年4月以来一直在返回埃塞俄比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费伊萨·利莱萨(Feyisa Lilesa)。他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上参与政治抗议后申请了美国的庇护。2018年10月21日，他回到埃塞俄比亚，并在机场受到该国外交部长等人的欢迎。自2018年6月紧急状态结束和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互联网网站、电台和电视频道的访问恢复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空间已经开放。2018年6月，政府授权开放之前被封锁的264个网站，包括在美国运营的ESAT网站。

6.8 自2018年4月以来，数千名政治犯获释，以犯下酷刑行为而臭名昭著的Maekelawi监狱已经关闭。艾哈迈德先生曾是信息网络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他进行了改革，修改了该机构的做法和架构。2018年6月，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名录被撤销。2018年11月12日，对36名国家安全官员发出了逮捕令，被告必须在亚的斯亚贝巴联邦高级法院出庭，以回应对被拘留者施行虐待的指控。此外，司法部长Berhanu Segaye宣布，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前管理层对2018年6月23日袭击总理负有责任。2018年11月15日，前国家情报和安全局代理局长Yared Zerihun和国有Ethio Telecom安全部门负责人Gudeta Olana被捕。

6.9 自 2014 年以来一直被拘留并被判死刑的 Ginbot 7 领导人 Tsege，与其他 575 名被拘留者一起，于 2018 年 5 月获得赦免并获释。然后，Tsege 先生回到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他的家人住在那里。同样，对流亡中的 Nega 先生的死刑判决也被撤销。

6.10 2018 年 6 月 22 日，Ginbot 7 宣布，在新政府宣布改革后，它正在放下武器。2018 年 7 月初，Ginbot 7 和其他两个组织从埃塞俄比亚政府设立的恐怖组织名单中被除名。2018 年 9 月，Nega 先生表示，Ginbot 7 今后将通过和平手段追求其政治目标。

6.11 2018 年 8 月底，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与包括 Ginbot 7 在内的各反对党达成协议，并成立一个负责协调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国家实体。2018 年 9 月初，几家媒体报道说，数百名前 Ginbot 7 战斗人员离开了厄立特里亚的基地，返回埃塞俄比亚，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地方当局和社区的欢迎。

6.12 2018 年 9 月 9 日，Nega 先生返回埃塞俄比亚，并受到一名部长和其他政府代表的欢迎。包括 Ginbot 7 的支持者在内的数千人聚集在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和国家体育场，庆祝他的回归。Nega 先生宣布将在全国举行讨论会，以确定未来的和平行动方案。

6.13 Ginbot 7 领导人回归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在奥罗米亚州，数千人挥舞着前埃塞俄比亚国旗欢迎该党领导人，这面旗帜曾用在反对前政权的抗议活动中。参与者没有受到伤害，而在 2018 年 3 月，12 名活动人士因挥舞这面旗帜而被逮捕。Nega 先生本人说，自从艾哈迈德先生被提名为总理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对埃塞俄比亚 Ginbot 7 的成员或其同情者，或正在返回该国的人而言，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风险。

##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程序

###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7.1 在审议来文中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它是否可根据《公约》第 22 条予以受理。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经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项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7.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委员会除非已查明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因此，委员会认定受理不存在任何障碍，并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 审议案情

8.1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参照各当事方提供的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至埃塞俄比亚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即在有充足理由相信某人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情况下不将某人驱逐、遣返(“驱回”)或引渡至另一国。

8.3 在本案中，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存在充分理由认为申诉人在返回埃塞俄比亚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切身风险。委员会评估这一风险时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sup>11</sup> 然而，委员会回顾，作出这一判断的目的是确定所涉个人在将要返回的国家是否面临可预见和真实的遭受酷刑的风险。<sup>12</sup> 因此，一个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本身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回到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表明当事人本人将面临风险。<sup>13</sup> 反之，没有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sup>14</sup>

8.4 委员会回顾关于参照《公约》第22条执行第3条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指出，凡有“充分理由”相信，有关个人，无论是作为有可能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的个人或群体成员，在他或她被驱逐回的国家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时，便存在不驱回义务。委员会回顾，只要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且真实的”，即存在“充分理由”。<sup>15</sup> 针对个人的风险迹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a) 族裔背景；(b) 申诉人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c) 遭受逮捕而又没有公平待遇和审判的保障；(d) 以前曾受过酷刑；(e) 在原籍国受过单独监禁或其他形式的任意和非法拘留；(f) 因酷刑威胁而秘密逃离原籍国；(g) 宗教信仰；及(h)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受到侵犯。<sup>16</sup>

8.5 委员会还回顾，举证责任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证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的和真实的。<sup>17</sup> 然而，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例如当申诉人已证明自己无法获得与其酷刑指控有关的文件或者已被剥夺自由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有关缔约国须调查指控并核实来文所依据的信息。<sup>18</sup> 委员会还回顾，它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各机关的事实结论；但委员会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因此，委员会将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依据每一案件的所有相关情况，自行评估所掌握的信息。<sup>19</sup>

8.6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鉴于他与 Ginbot 7 及其前身 Kinijit 党有政治关系，他担心一到埃塞俄比亚就被逮捕和遭受酷刑。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的一些说法，即他于 2006 年 10 月被监禁，并因其在 Kinijit 党内的活动而受到酷刑，然后于 2007 年 2 月获释。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在 Ginbot 7 内的活动使他数次被警方拘留，他于 2013 年离开埃塞俄比亚，因为害怕他的上级向警方报

<sup>11</sup> 除其他外，见 E.T.诉荷兰(CAT/C/65/D/801/2017)，第 7.3 段。

<sup>12</sup> E.T.诉荷兰案，第 7.3 段。

<sup>13</sup> Y.G.诉瑞士案，(CAT/C/65/D/822/2017)，第 7.2。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第 11 段。

<sup>16</sup> 同上，第 45 段。

<sup>17</sup> 除其他外，见 E.T.诉荷兰，第 7.5 段。

<sup>18</sup> 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第 38 段。

<sup>19</sup> 同上，第 50 段。

告。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关于他在瑞士期间继续在 Ginbot 7 内活动的说法。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瑞士庇护当局在可信度方面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他对相关事件的描述是详细和一致的；鉴于他提供了背部伤疤的照片，瑞士当局本应下令对其酷刑迹象的进行体检；埃塞俄比亚当局已经宣布 Ginbot 7 为恐怖组织，公布了其关注的各持不同政见组织的目标成员；而且他的个人情况足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为证实其说法而提供的各种文件，包括体检报告、Ginbot 7 的信件和他的各项政治活动的照片。

8.7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立场，即申诉人关于被监禁和遭受酷刑的描述含糊不清，闪烁其辞，因此不可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申诉人声称在 2011 年几次带着有效护照离开埃塞俄比亚，并且能够返回该国，且没有与当局产生麻烦。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立场，即申诉人在瑞士的各种活动并不能证明他在返回埃塞俄比亚后将面临酷刑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据缔约国称，自艾哈迈德先生于 2018 年 4 月就任总理以来，埃塞俄比亚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埃塞俄比亚政府于 2018 年解除了对 Ginbot 7 的禁令，并欢迎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返回该国。

8.8 委员会回顾，必须查明申诉人目前是否面临在埃塞俄比亚遭受酷刑的风险。<sup>20</sup>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由于他在 Kinijit 党内的活动，他于 2006 年底至 2007 年初在该国遭到拘留和酷刑，但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在 2011 年几次安全地离开和返回埃塞俄比亚。委员会回顾，当申诉人请求体检以证明他们受到酷刑的说法时，无论当局认为他们的说法可信与否，原则上应进行体检。这样才能确保决定强迫遣返案件的当局能够根据体检结果客观地完成对酷刑风险的评估，不掺杂任何合理的怀疑。<sup>21</sup> 然而，委员会还回顾，虽然过去遭受的虐待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评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申诉人目前是否面临风险，即如果返回埃塞俄比亚就会遭受酷刑。<sup>22</sup> 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从据称遭受酷刑的时间到 2013 年要求体检的时间大约是 6.5 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这段时间之后，申诉人如果返回埃塞俄比亚仍有遭受酷刑的风险。

8.9 关于申诉人声称他在 Ginbot 7 内的活动会使他面临一旦返回即被特勤局逮捕和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2018 年 6 月，Ginbot 7 宣布，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计划改革，它将放弃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斗争。委员会注意到，2018 年 7 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Ginbot 7 从其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sup>23</sup> 委员会注意到，2018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总统赦免了 Ginbot 7 秘书长 Tsege 先生，并将他从拘留中释放。<sup>24</sup>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说法，即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流亡异见人士回国后将其逮捕，但委员会注意到，2018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赦免了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和政治反对者的流亡埃塞俄比亚人，且该国总理邀请他们返回

<sup>20</sup> 除其他外，见 G.B.M.诉瑞典(CAT/C/49/D/435/2010)，第 7.7 段。

<sup>21</sup> 除其他外，见 S.S.B.诉丹麦(CAT/C/60/D/602/2014)，第 8.7 段。

<sup>22</sup> S.S.B.诉丹麦，第 8.7 段。

<sup>23</sup> 除其他外，见人权观察，“埃塞俄比亚”，《2019 年世界报告：2018 年事件》(纽约，2019 年)。

<sup>24</sup> 见 BBC 新闻，“埃塞俄比亚释放死囚被绑架的英国人 Andargachew Tsege”，2018 年 5 月 29 日。

该国并以和平方式追求政治生活。<sup>25</sup> 委员会注意到有报告表明，根据大赦法已有数千名囚犯被赦免，且具体措施已制定出来，以确保对国家官员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sup>26 27</sup>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担心他会成为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目标，因为他与 Ginbot 7 领导人 Nega 先生一起被拍进了照片，但委员会注意到，Nega 先生在其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后于 2018 年 9 月返回埃塞俄比亚，并受到政府高级官员的欢迎。委员会虽然注意到申诉人声称，他在 ESAT 的电台采访会使他在埃塞俄比亚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但又注意到，2018 年政府撤销了对博客作者、记者和散居海外的媒体组织的所有未决指控，其中包括 EAST。2018 年 6 月 EAST 在亚的斯亚贝巴重新开播。<sup>28 29</sup>

8.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据，即，2019 年 1 月联邦行政法院维持了一起个人的庇护上诉，该人声称由于在所有阿姆哈拉人民组织内的持不同政见活动而在埃塞俄比亚遭到监禁和酷刑，并且在瑞士期间继续进行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政治活动。委员会还注意到，法院的结论是，尽管埃塞俄比亚承诺进行政府改革，但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可能再次变得不稳定，因此该国政治活动家的未来状况尚不明朗。然而，委员会回顾，它必须审查申诉人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是否面临可预见的人身伤害风险。委员会的评估并不是基于一个假设的风险，即如果执政一年多的政权破坏了未来的政治局势，处于申诉人处境中的个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在同样于 2019 年 1 月发布的另一项裁决中，法院拒绝了一名埃塞俄比亚国民的庇护申请，该人声称作为 Ginbot 7 的成员，鉴于他在瑞士的相关政治活动，他在埃塞俄比亚将面临风险，<sup>30</sup> 在该裁决中，法院在审查了相关报告后认为，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8.11 考虑到上述 Ginbot 7 成员在埃塞俄比亚的具体情况的变化，以及申诉人在 2011 年能够多次安全离开埃塞俄比亚并返回的事实，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构成充分理由认定，如果今天返回埃塞俄比亚，他将面临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真实的酷刑风险。

9. 基于上述考虑，并根据委员会收到的材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使委员会能够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埃塞俄比亚会使其面临《公约》第 3 条含义范围内的可预见、真实、现实存在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

10. 委员会依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定缔约国将申诉人遣送回埃塞俄比亚不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情事。

<sup>25</sup> 除其他外，见路透社，“埃塞俄比亚大赦最近获释的政治犯”，2018 年 7 月 20 日；和国际危机组织，“管理埃塞俄比亚的未决之过渡”，第 269 号报告，2019 年 2 月 21 日。

<sup>26</sup> 除其他外，见路透社，“Abiy 的埃塞俄比亚赦免了被控叛国或恐怖主义的 13,000 人”，2019 年 1 月 22 日。

<sup>27</sup> 除其他外，见大赦国际，“埃塞俄比亚：逮捕数十名安全官员，迈向问责的第一步”，2018 年 11 月 12 日。

<sup>28</sup> 除其他外，见路透社，“一位埃塞俄比亚政客在流亡多年后带着希望和恐惧返回家园”，2018 年 11 月 7 日。

<sup>29</sup> 除其他外，见人权观察，“埃塞俄比亚”，《2019 年世界报告：2018 年事件》；见自由之家，2019 年世界自由，“埃塞俄比亚”。

<sup>30</sup> 瑞士，联邦行政法院，E-4254/2017 号决定，2019 年 1 月 8 日。